

#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

——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杨 婵, 贺小刚, 李征宇

**[摘要]** 很多学者从个体特质与外部环境的角度探讨农民创业行为,而实际上农民的创业选择深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结构如何影响到农民的创业选择,这是一个仍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家庭资本理论将家庭结构分为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并使用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就两种类型的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农民的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如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拥有党员身份、或者是村里公认的德高望重者,将显著提高其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而人力残缺家庭,即家庭结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家庭,如父母离异、兄弟姐妹残疾、老人或子女残疾等,将显著降低其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②社会精英家庭的农民创业主要是机会驱动、寻求更大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即典型的机会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虽然不倾向于创业,但一旦选择创业则主要是出于生存或改善现状考虑,即典型的生存型创业。③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作用还受到区域关系文化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地处强关系文化区域的社会精英家庭将更大程度地提高其家庭成员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本文深入剖析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创业行为的内在决定性机理,有助于探索激励农民创业行为的家庭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民创业理论范式新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创业; 农民; 社会精英家庭; 人力残缺家庭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7)12-0170-19

## 一、问题提出

关于创业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多数学者均以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或者简单地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等同起来进行研究。基于组织生态理论,居民所处的环境将对个体决策产生重要的作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无论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还是经济环境等方面都存在本质性

**[收稿日期]** 2017-08-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族连带、决策行为选择与私营企业成长机制研究”(批准号 716721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农地经营权流转:动力机制与策略互动”(批准号 17YJC790069);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制度环境、创业与组织决策行为”(批准号 2016110394)。

**[作者简介]** 杨婵(1982—),女,浙江乐清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贺小刚(1971—),男,江西永新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李征宇(1985—),男,山东济南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通讯作者:贺小刚,电子邮箱:hxg@mail.shufe.edu.cn。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的差异,很有必要针对嵌入农村这一独特生态环境下的个体创业行为进行深入探讨。现有的关于农村创业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①个体特质论。Folmer et al.(2010)认为个体的年龄、学历、婚姻状态、子女数量以及收入水平等是决定农民创业与否的主要因素;Li et al.(2012)提出,农民工作是否努力、意志是否坚强、是否具备战略眼光、能否承担社会责任等才是其创业成功的关键;Scott(2012)则将视角转向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认为创业培训、创业咨询及社区支持才是农民创业的关键影响要素;Komppula(2014)认为,创新意识、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责任心是农村情景下提升创业者竞争力的关键。②资源基础观。除了创业者特质,资源的异质性和稀缺性也是农民创业行为的重要驱动要素。Grande(2011)通过对挪威农场的调研发现,传统的民间技艺、农家特产、奇特的地貌建筑等都是支撑农民创业的独特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村落特有资源并从中获取收益是农民成功创业的关键所在。除了传统的有形资源,学者们还逐渐注意到无形资源对于农民创业的重要性,Ma(2002)认为社会资本的增加将提高农民创业的积极性,社会文化因素对农民创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有时甚至成为决定农民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③环境制度观。Nee(1992)研究发现,威权政体特征下的政府直接干预将阻碍创业活动,地方政府干预越多,农户的创业水平越低。还有学者从制度的视角讨论了政府管制、社会规范及认知等要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Yu et al., 2013)。

前期关于农民创业的研究多以个体为研究对象强调个体特质、资源、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较少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展开讨论。而实际上,农村地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缺乏社会稳定性,诸如干旱、疾病、死亡等结构变化因素将使农户迅速走向没落。Dew et al.(2009)的研究表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的裂变将导致其可利用资源储备的减少,进而削弱了个体创建新企业的能力。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George et al.(2016)认为,在绝对贫穷的状态下,社会结构的崩溃,尤其是家庭结构的突变可能会激发农民通过创业模式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即绝境状态的社会结构突变反而能激发农民创业的动机。

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情境下“家”的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农民普遍受到“家族文化”和“恋土情结”的影响,家庭特有的血缘、亲缘、感情所形成的内聚力有助于农民对抗创业过程的风险和挑战。加之农村地区往往基础设施薄弱、融资渠道不畅、创业培训不足,这使得农民无法像城镇居民那样容易获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源与专业化服务,所以他们对“家”的依附性更加强烈。家庭支持不仅有助于提高创业者获取资源的能力,家族所延伸的亲缘关系对于农民的身体、情感以及经济稳定性均将产生重要作用。尤其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传统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家庭结构将对其决策行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农民的个体决策往往是基于其家庭状况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因此,家庭结构成为影响农民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鲜有文献从这一角度构建农民创业决策模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主要研究问题:农民的创业决策行为与家庭结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例如,家庭的精英背景以及家庭人力资本的残缺是否会影响农民的创业选择?出身于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民在创业动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作用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

本文以家庭结构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农民创业选择模型,从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两个维度探索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与创业动机的影响,并将区域关系文化纳入研究范畴,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农民创业模型,丰富了创业理论的研究框架。

## 二、理论与假设

### 1. 家庭结构: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

传统的家庭结构一般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及残缺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结构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家庭资本理论(Family Capital Theory),家庭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仅存在于家庭关系内部,由于家庭成员之间更具交互的频繁性、连接的紧密性、关系的持久性,家庭资本较其他社会资本更容易达到社会闭合状态(Social Closure),个体目标也将快速向家庭集体目标趋同,因而家庭资本较其他社会资本更具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与不可替代性,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一系列排他性优势,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关键战略资源(Hoffman et al., 2006)。然而,不同家庭所拥有的家庭资本构成与存量截然不同。由此,本文将农村家庭结构分为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两种类型进行对比分析。

关于精英的界定,帕累托(2003)认为:“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他强调精英的优异特质和能力素养。全志辉(2002)认为:“精英是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他强调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与普通村民相比,农村精英由于更具能力素养与资源优势而获得村落权威,他们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杨善华,2000)。有学者将农村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全志辉和贺雪峰,2002),体制内精英多指村干部,他们一般掌握村落正式权力;体制外精英虽然不具备正式权力,但通常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传统的“乡绅”等。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精英可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陆学艺,2001)。借鉴国外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本文将“精英”嵌入到农村家庭之中,衍生得到农村社会精英家庭的概念。基于精英主义理论社会异质性的逻辑起点,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普通家庭,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本,在经济、能力、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任度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在农村场域的关系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

尽管农村家庭的精英背景可能会为家庭成员带来充裕的资源,但很多农户的家庭结构缺乏稳定性,旱涝灾害等环境突变因素以及疾病死亡等家庭突变因素将使农民创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让农户家庭迅速瓦解。George et al.(2016)认为,成年家庭成员的构成与稳定性的破坏将导致家庭社会结构的突变,比如家庭成员的死亡、伤残、监禁、父母离异、感染 AIDS、邻里纠纷等,都属于家庭结构突变的范畴,进而派生出人力残缺的家庭结构。区别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人力残缺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且家庭负担更重,家庭资本相对匮乏,家庭结构也更为脆弱(Dercon,2004),其可以用于冒险的资源投入(即可承担损失)相对有限,因而从事创业行为的概率较低。

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过程中,个体往往基于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进行理性决策(Barney,1991)。创业资源是创业者在向社会提供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所拥有的能够实现创业目标的各种要素组合(Barney,1991),也是制约个体创业与否的关键因素。根据家庭资本理论,家庭资本是影响个体决策行为的战略性资源(Hoffman et al.,2006),在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农村社会中,农民行为决策受到“家文化”的广泛影响(费孝通,2008),农民的创业决策与结果也将受到家庭的约束。家庭是农民在经济、情感等多方面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的创业资源可以拓展到家庭范围,家庭成员与生俱来及后天获取的资源、能力和技术通常可以被每位家庭成员所利用(罗明忠和罗琦,2016),家庭资本是农民个人禀赋的外延。因此,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将受到家庭资本状态的影响和制约,进而会基于家庭资本的丰裕程度做出是否创业的决策(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不同结构类型的家庭在资本丰

裕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本文拟从农村家庭结构出发,探索资源约束背景下的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 2. 基本假设

(1)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社会精英家庭所衍生的充裕的家庭资本将有助于农民创业者跨越资金门槛。创业启动资金是自主创业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但是农民创业者获取银行贷款难度更大,因为农民创业通常依托农业生产经营,企业经营状况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同时受制于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周期。加之农民贷款缺乏担保和抵押,在农村很难寻找到拥有稳定收入者作为担保主体,且农民通常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因此银行给农民创业者投放贷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家庭的精英背景有助于改善农民创业者的融资环境,社会精英家庭的“信号效应”有助于降低个体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银行因掌握更多社会精英家庭成员的信息而愿意为其提供贷款融资。例如,农户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或德高望重者,表明社会和村落对该家庭具有很高的认可度,这种积极的信号也使银行更可能将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创立的企业列为潜在优质客户,使其更容易获取稀缺的信贷资源,进而提高农民创业的可能性。

另外,社会精英家庭背景还有助于农民创业者获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政府资源及信息资源等。①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可以为私有产权提供非正式的保护,弥补制度缺陷,减少制度缺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吴一平和王健,2015)。与普通村民相比,社会精英家庭成员与政府官员接触的机会更多,进而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卫武,2006),以此来谋求有利的市场环境,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私有产权(Bai et al.,2006)。私有产权对创业者而言具有很强的心理作用,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不仅提高了创业者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且有助于激发并维持创业的动力(Bowen and De Clercq,2008)。②社会精英家庭的潜在创业者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获取政府资源与政府支持。精英身份意味着社会的认可,其衍生而来的光环效应使他们更容易结交政府官员,由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所创建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合法性、政府补贴、政府订单等。尤其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建设仍不完善,此时拥有社会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创业者更容易从现存体制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改善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使其在税负、土地、信贷以及行业进入等方面享受优先的待遇(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③在缺乏结构性支持的情况下,社会精英家庭背景还可以为农民创业者带来诸如行业走势、经济干预等方面的信息,增加制度环境的可预测性,降低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创业活动的发生概率。

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可能会为农户带来充裕的资源,但人力残缺家庭通常收入水平较低,负担更重,家庭结构也更为脆弱(Dercon,2004),可承担损失也相对较少,因而从事冒险性创业行为的概率较低。前景理论认为,潜在的收益机会与损失威胁是个体从事冒险性行为的两大机制(March and Shapira,1992)。有学者提出,个体追求创业的前提是其能预测到未来可能的回报将超出其付出的成本(Sarasvathy,2001),但是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或者根据历史数据可能得出模棱两可的导向,决策者对未来的预期时常无效,而且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还涉及到个体行为与市场其他主体的复杂交互过程,标准的风险收益率测算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因此,决策者可能偏好于非预测性战略,如根据可能存在的损失威胁,即可承担损失(Affordable Loss),进行冒险决策行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Miller and Leiblein,1996)。可承担损失基于行为理论(如有限理性)讨论个体的冒险性行为,通常指决策者估算的其可用于冒风险的资源,即愿意为某一特定行为而失去的资源(Dew et al.,2009)。在创业情境下,可承担损失是指创业者设定的、为了从事创业这一冒险性行为而愿意承担的损失上限,且该损失不至于让个体无法维持生计。

可承担损失不仅取决于冒险性行为,还受到创业者自身、创业者家庭以及创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相对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或正常家庭,人力残缺家庭的收入水平更低,家庭负担更重,由于传统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同样适用于创业决策,人力残缺家庭没有多余的资源划入可承担损失账户,更多地归为不可损失账户(如孩子的教育基金、伤残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等)。所以,个体的创业能力与创业动机将随着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瓦解逐渐蜕化,当家庭中出现离异、伤残等情况时,个体将感知到家庭可承担损失在减少(Dew et al.,2009),可以用于资助创业的资金也相应减少(Aldrich and Cliff,2003),因而抑制了其创业的动力。此外,创业将占用个体大量的时间,而人力残缺家庭的个体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中的弱势成员,创业行为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工作家庭冲突,因而降低了其创业的可能性。最后,人力残缺家庭中的潜在创业者能获取的战略支持与情感支持相对有限(Renzulli et al.,2000),资金与情感支持的短缺减少了其搜集创业资源的合理手段,进而削弱了创业的积极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a:处在社会精英家庭的农民将倾向于选择创业活动。

假设 1b:处在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不倾向于选择创业活动。

(2)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不可否认,部分人力残缺家庭中依然存在农民创业的现象,且这部分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应该区别于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因此本文试图探索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在创业动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关于创业动机,Gilad and Levine(1986)提出了推拉理论,推动理论(Push Theory)强调个体创业行为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如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寻求更好的工资待遇等。而拉动理论(Pull Theory)则突出个体创业行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认为个体创业是为了寻求独立与自我实现等,且这些积极因素对创业的激励作用更大(Amit and Muller,1995)。Bird(1989)等认为内在激励是进行创业的主要动机,如成为自己的老板、掌控未来、个人成就感等;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利益才是创业的主要动机,如获取更高的报酬、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等;Choo and Wong(2006)则认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共同驱动才会激发个体的创业行为。全球创业观察(GEM)根据创业动机把创业活动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是指那些迫于生存压力而又没有其他更好选择方案时所进行的创业行为,其创业的目的是生计所迫或者对现状不满。而机会型创业多由商业机会驱动,其创业的主动性更强,创业的目的也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回报,而是为了追求独立、自我实现或更大的发展空间等。中国学者窦大海和罗瑾琰(2011)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创业动机归纳为“经济需要的激励”和“社会需要的激励”。经济需要主要是出于生理和安全等最基本的需要,社会需要主要是指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如获取社会地位、认可尊重、更大独立、个人成就价值等。一般而言,创业者经济条件较差时经济性动机会更强,经济状况较好时创业动机会变得更为复杂,且社会性动机将进一步增强(罗明忠,2012)。学术界对创业动机的研究并无定论,但目前对创业动机的研究主要以全球创业观察(GEM)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为主,以往学者对创业动机的各种诠释基本上可以归到这两类之中。

就农民的创业动机,罗明忠(2012)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农村环境中,生存需要是农民创业的主要驱动力,但实际上个体特质、家庭状况及客观环境等因素都将影响农民的创业动机。中国农村的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所拥有的成员个体特质以及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创业动机。农村社会精英家庭的成员通常具有较为体面的工作,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条件一般比较富裕,几乎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所以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创业的驱动力并非迫于生计或经济利益的诉求,更多的是为了得到认可、独立以及自我实现等而选择创业,自

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等社会性动机在社会精英家庭农民创业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相对而言,人力残缺家庭成员更多地出于经济性动机而选择创业,一方面,由于父母离异、家人伤残等原因导致家庭劳动力缺失,进而降低了家庭收入的创造能力和整体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人力残缺家庭往往比正常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此类家庭更关注如何获取更高的报酬,增加收入来提高家庭的总体经济水平,为家庭稳定提供经济保障,进而改善生活现状。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2a:处在社会精英家庭的农民更多地是受到社会需要的激励而选择创业,其创业的社会性动机较强,即倾向于机会型创业。

假设 2b:处在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更多地是受到经济需要的激励而选择创业,其创业的经济性动机较强,即倾向于生存型创业。

(3)区域关系文化的制约作用。制度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个维度,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个体创业决策更容易受到非正式制度框架的约束,如传统、习俗和文化等(North,1990)。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尤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际关系在关系文化较强的环境下起到积极的“润滑剂”作用(Chen et al.,2011),不仅有助于打破计划经济背景下相对僵化的体制桎梏,而且有助于个体与组织摆脱资源约束,推动其创业创新精神(Aidis et al.,2008)。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地区,社会精英家庭背景更容易成为获取资源的有效手段,社会精英家庭所派生出来的社会网络可以为农民创业者带来更优越的政策环境,使其在税负、土地、信贷以及行业进入等方面享受优先的待遇,因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而在关系文化较弱的区域,创业者们相对较少地嵌入关系网络之中,因而不易受到关系文化的束缚(李新春等,2016),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创业资源。此时,社会精英家庭背景的制度替代效应将显著减弱,对农民创业的激励作用也将有所下降。对于人力残缺家庭而言,由于家庭成员的死亡、伤残、监禁、离异等使得家庭结构遭到重创,残缺的人力资本降低了家庭收入、增加了家庭负担,家庭中可用于建立和维系关系的资源相对较少,进而导致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因此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区域,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更加无法获取创业所需的稀缺资源,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3a:区域关系文化在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相对于那些关系文化较弱的区域,社会精英家庭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区域更能激发农民创业。

假设 3b:区域关系文化在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相对于那些关系文化较弱的区域,人力残缺家庭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区域更加不能激发农民创业。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认为,社会精英家庭将提高农民创业的可能性,而人力残缺家庭则降低了农民的创业发生概率。另外,社会精英家庭出身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出身的农民则更倾向于生存型创业。最后,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冒险性创业行为还将受到区域关系文化的制约。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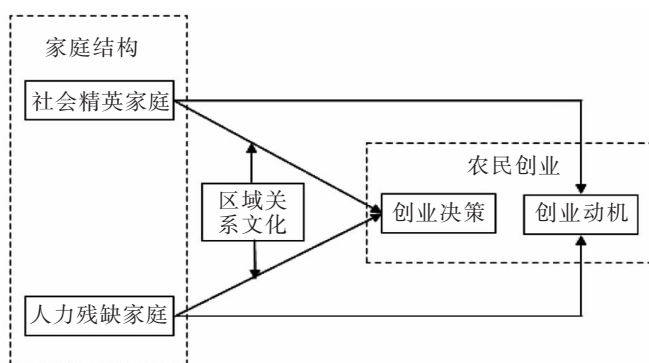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的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三、数据与变量

#### 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进行的“中国千村调查”,该项目始于2008年,旨在通过对中国“千村万户”的社会调研,深度了解中国“三农”问题。2016年度项目的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调研方法与历次千村调查的方法相一致,即包括定点调研与返乡调研两种方式。其中定点的调研团队主要由30位带队老师及300多名学生组成,调查对象则通过分层多阶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得以确定,调研团队首先在全国22个省份抽取30个县,然后从各县抽取2个具有代表性的镇,之后从这2个镇中抽取10个村落,最后从每个村落中随机抽取5户创业家庭和10户非创业家庭。返乡调研则是通过大学生暑假返回村落的机会要求学生完成调研活动,每位返乡的学生完成1—2个村的调研活动。2016年千村调查的对象包括镇长、村长/支书、村委会班子、村民(包括创业者和非创业者)。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源自村民问卷,在剔除了一些回答不完整的调查问卷之后,最终得到14133份有效问卷。

样本的区域分布情况。华东地区样本5529个,占总样本量的39.12%;华中地区样本2196个,占总样本量的15.54%;西南地区样本2122个,占总样本量的15.01%;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地区的样本分别为1486个(10.51%)、1245个(8.81%)、781个(5.53%)、774个(5.48%)。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人均消费支出9223元,样本村落2015年人均纯收入为15595元,人均消费支出为9146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本文通过t检验方法发现样本与全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2. 变量设计

(1)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家庭结构(*FamStruc*)。基于家庭资本理论与不同家庭结构的特征,本文将农村家庭结构分为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就社会精英家庭而言,农村精英群体通常包括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一般是指村级干部,而体制外精英主要包括经济精英、宗族精英、帮派势力(仝志辉和贺雪峰,2002)。也有学者将非在任的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或村民党员纳入农村精英的范畴(吴愈晓,2010)。基于此,本文将农村家庭成员中拥有村干部、党员或德高望重者的家庭界定为社会精英家庭(*Elite*)。另外,农村家庭通常缺乏社会稳定性,洪涝灾害、疾病死亡等因素可以让农户迅速瓦解,家庭成员的死亡、伤残、监禁、父母离异、感染AIDS、邻里纠纷等很容易引起家庭结构的突变和残缺(George et al.,2016)。鉴于此,本文将存在父母离异、兄弟姐妹残疾、老人或子女残疾等情况的家庭定义为人力残缺家庭(*Disinte*)。

(2)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民创业决策与创业动机。关于农民创业决策(*Entrepre*),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将填写创业者问卷的个体赋值为1,填写非创业者问卷的个体赋值为0。关于农民创业动机(*EntrepreMoti*),本文将创业原因为“发现了机会”“寻求更大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的定义为机会型创业(*Opp*),将创业原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或“改善生活”的定义为生存型创业(*Survival*)。由于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0—1哑变量,故本文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并通过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3)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区域关系文化(*Relation*)。关系文化属于区域亚文化的范畴,关系被运作的频繁程度以及企业对关系的重视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个体或组织用于维系关系的投入越多,说明其对关系的重视程度越大,其所在区域的关系文化也越强(朱光伟等,2014)。建立和维持关系需要投入时间资本与物质资本,本文借鉴李新春等(2016)的做法,通过计算

各省份关系活动中时间与人情平均投入强度来衡量地区的关系文化指数,具体计算过程如下:①计算出各个省份受访者用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的时间以及用于各种经营关系的建立、维护上下游及同行等关系的时间  $t_1, t_2, \dots, t_i$ 。②依次计算出样本中各个省份受访者近一年来平均人情往来总支出  $m_1, m_2, \dots, m_i$  和全国平均人情往来总支出  $M_s$ 。③用当期全国平均工资  $\gamma_s$  及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  $\beta_i$  来消除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层次的差异。④按照公式(1)计算得到  $i$  省  $s$  年的关系文化指数  $Relation_{s,i}$ :

$$Relation_{s,i} = \left( 1 + \frac{m_i \gamma_s}{M_s \beta_i} \right) \cdot t_i \quad (1)$$

(4)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民个体、家庭及区域层面的特征变量,用来控制个体、家庭及区域层面的异质性。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①性别(*Gender*),男性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②年龄(*Age*);③婚姻状况(*Marriage*),已婚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④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⑤父母期望(*Expectation*),以“父母望子成龙心切”程度衡量,采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父母期望“很低”,6表示父母期望“极高”;⑥个人技能(*Handicraft*),用“是否有某种手艺、技能”来衡量,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⑦个人网络(*Network*),用“通讯录里联系人数量”表示;⑧个体人力资本(*HmnCapital*)。考虑到很多学者采用受教育程度来度量个体、团队或组织的人力资本状况(李海峥等,2013),本文拟采用“受教育年限(年)”作为农民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小学学历赋值为5,初中学历赋值为8,高中/中专学历赋值为11,大专学历赋值为14,大学本科学历赋值为15,硕士研究生学历赋值为17,博士研究生学历赋值为20。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①家庭总人数(*Faminum*);②家庭男性劳动力比重(*Maler*);③人均耕地数量(*Farmland*);④家庭收入水平(*Income*);⑤家庭社会地位(*Socistatu*)。最后,考虑到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各省的市场化指数(*Mkt*)。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 四、实证分析

### 1. 回归模型

为了考察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区域关系文化的调节效应,本文设定了以下待检验模型:

$$Entrepre_i = \alpha_0 + \alpha_1 Relation_i + \alpha_2 FamStruc_i + \alpha_3 FamStruc_i \cdot Relation_i + \alpha_4 C_i + \varepsilon_i \quad (2)$$

$$EntrepreMoti_i = \beta_0 + \beta_1 FamStruc_i + \beta_2 C_i + \varepsilon_i \quad (3)$$

(2)式中的  $Entrepre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是否选择创业活动的决策;(3)式中的  $EntrepreMoti_i$  也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创业动机,包括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2)式中的  $Relation_i$  为调节变量,表示农民  $i$  所在区域的关系文化指数; $FamStruc_i$  为解释变量,表示家庭结构,该变量包括两个维度,分别为社会精英家庭(*Elite<sub>i</sub>*)和人力残缺家庭(*Disinte<sub>i</sub>*); $C$  为控制变量; $\varepsilon$  为残差项。 $\alpha_2$  用来分析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 $\alpha_3$  用于分析区域关系文化对家庭结构和农民创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beta_1$  用于分析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效应。

### 2. 基本模型检验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指标均为0—1哑变量,因而可以采用Logit模型进行检验。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Flannery and Rangan,2006)。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也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ntrepre</i>	是否创业	14133	0.2785	0.4483	0.0000	1.0000
<i>Survival</i>	生存型创业	4600	0.4724	0.4993	0.0000	1.0000
<i>Opp</i>	机会型创业	4600	0.1652	0.3714	0.0000	1.0000
<i>Elite</i>	社会精英家庭	14133	0.2252	0.4177	0.0000	1.0000
<i>Disinte</i>	人力残缺家庭	14133	0.1085	0.3111	0.0000	1.0000
<i>Relation</i>	关系文化指数	14133	48.4268	13.7666	20.5809	96.7785
<i>Gender</i>	性别	14133	0.7407	0.4382	0.0000	1.0000
<i>Age</i>	年龄	14133	45.1224	11.9981	19.0000	75.0000
<i>Marriage</i>	婚否	14133	0.8917	0.3107	0.0000	1.0000
<i>Religion</i>	宗教信仰	14133	0.0889	0.2846	0.0000	1.0000
<i>Famimum</i>	家庭成员人数	14133	3.9077	1.4533	1.0000	9.0000
<i>Maler</i>	家庭男性劳动力比重	14133	0.4806	0.2130	0.0000	1.0000
<i>Farmland</i>	人均耕地数量(亩)	14133	2.0896	5.1945	0.0000	40.0000
<i>Income</i>	家庭收入水平(万元)	14133	12.1286	18.5178	0.0000	120.0000
<i>Network</i>	个人网络;手机联系人数量	14133	133.6947	145.8127	0.0000	843.0000
<i>Mkt</i>	市场化指数	14133	7.3460	1.8935	0.6200	9.7800
<i>Expectation</i>	父母期望	14133	3.8913	1.1543	1.0000	6.0000
<i>Handicraft</i>	个人技能	14133	0.3268	0.4690	0.0000	1.0000
<i>Socistatu</i>	家庭社会地位	14133	0.7490	1.0381	0.0000	4.0000
<i>HmnCapital</i>	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年)	14133	9.6579	3.0424	0.0000	20.000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2 列示了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关系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 1、模型 2 分析了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及区域关系文化的调节效应;模型 3、模型 4 分析了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及区域关系文化的调节效应;模型 5 为全变量模型。

表 2 模型 1 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eta=0.17$ ,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 2、模型 5 中依然稳健,说明家庭成员的精英背景将显著提高农民创业的概率,假设 1a 得到支持。表 2 模型 2 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区域关系文化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beta=0.01$ ,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 5 中依旧稳健,说明区域关系文化在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3a 得到支持。表 2 模型 3 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eta=-0.43$ ,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 4、模型 5 中依然稳健,说明家庭人力资本的残缺将显著降低农民创业的概率,假设 1b 得到支持。表 2 模型 4 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区域关系文化指数的交互项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区域关系文化在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并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3b 没有得到支持。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家庭人力资本残缺对农民创业的消极作用具有较强的刚性,这种抑制效应并不随着外部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区域关系文化的增强或减弱并不能改变家庭人力资本残缺引起的资源约束、社会网络不足等问题,弱势农民创业的关键影响因素还是资源的充裕与否,因而区域关系文化的强弱并不能改变家庭人力残缺对个体创业的抑制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倾向于选择创业活动,而人力残缺家庭成员创业的概率相

表2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决策

	M1	M2	M3	M4	M5
<i>Gender</i>	0.4932*** (0.0539)	0.4919*** (0.0539)	0.4823*** (0.0538)	0.4823*** (0.0538)	0.4941*** (0.0540)
<i>Age</i>	0.1739*** (0.0137)	0.1741*** (0.0137)	0.1697*** (0.0136)	0.1697*** (0.0136)	0.1735*** (0.0137)
<i>Age<sup>2</sup></i>	-0.0020*** (0.0001)	-0.0020*** (0.0001)	-0.0019*** (0.0001)	-0.0019*** (0.0001)	-0.0020*** (0.0001)
<i>Marriage</i>	0.7065*** (0.0959)	0.7100*** (0.0959)	0.7037*** (0.0960)	0.7042*** (0.0960)	0.6925*** (0.0962)
<i>Religion</i>	-0.0638 (0.0774)	-0.0617 (0.0775)	-0.0607 (0.0774)	-0.0606 (0.0774)	-0.0598 (0.0775)
<i>Faminum</i>	0.0930*** (0.0158)	0.0924*** (0.0158)	0.0983*** (0.0157)	0.0983*** (0.0157)	0.0916*** (0.0158)
<i>Maler</i>	0.3746*** (0.1077)	0.3757*** (0.1078)	0.4114*** (0.1070)	0.4117*** (0.1070)	0.3667*** (0.1081)
<i>Farmland</i>	0.0211*** (0.0039)	0.0208*** (0.0039)	0.0212*** (0.0039)	0.0212*** (0.0039)	0.0207*** (0.0039)
<i>Income</i>	0.0309*** (0.0014)	0.0309*** (0.0014)	0.0307*** (0.0014)	0.0307*** (0.0014)	0.0308*** (0.0014)
<i>Network</i>	0.0034*** (0.0002)	0.0034*** (0.0002)	0.0035*** (0.0002)	0.0035*** (0.0002)	0.0034*** (0.0002)
<i>Mkt</i>	-0.0305** (0.0120)	-0.0304** (0.0120)	-0.0313*** (0.0120)	-0.0313*** (0.0120)	-0.0323*** (0.0120)
<i>Expectation</i>	0.0763*** (0.0185)	0.0757*** (0.0186)	0.0823*** (0.0185)	0.0822*** (0.0185)	0.0767*** (0.0186)
<i>Handicraft</i>	0.1185*** (0.0440)	0.1186*** (0.0441)	0.1139*** (0.0441)	0.1140*** (0.0441)	0.1133** (0.0441)
<i>Relation</i>	-0.0071*** (0.0016)	-0.0070*** (0.0016)	-0.0071*** (0.0016)	-0.0071*** (0.0016)	-0.0071*** (0.0016)
<i>Socistatu</i>	0.0377* (0.0201)	0.0398** (0.0202)	0.0395** (0.0202)	0.0396** (0.0202)	0.0393* (0.0202)
<i>HmnCapital</i>	0.1062*** (0.0338)	0.1055*** (0.0338)	0.0986*** (0.0337)	0.0986*** (0.0337)	0.1014*** (0.0339)
<i>HmnCapital<sup>2</sup></i>	-0.0077*** (0.0018)	-0.0076*** (0.0018)	-0.0071*** (0.0018)	-0.0071*** (0.0018)	-0.0074*** (0.0018)
<i>Elite</i>	0.1712*** (0.0526)	0.1689*** (0.0527)			0.1711*** (0.0528)
<i>Elite×Relation</i>		0.0131*** (0.0037)			0.0132*** (0.0037)
<i>Disinte</i>			-0.4322*** (0.0753)	-0.4329*** (0.0754)	-0.4355*** (0.0755)
<i>Disinte×Relation</i>				-0.0013 (0.0056)	-0.0014 (0.0056)
<i>Cons</i>	-7.0593*** (0.3713)	-7.0751*** (0.3713)	-6.9770*** (0.3712)	-6.9759*** (0.3712)	-6.9763*** (0.3720)
Chi <sup>2</sup>	2727.49	2740.17	2751.85	2751.90	2775.46
Pseudo R <sup>2</sup>	0.1631	0.1639	0.1646	0.1646	0.1660
N	14133	14133	14133	14133	14133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较小,但这并不能排除个别人力残缺家庭成员创业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以4600个农村创业者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精英家庭成员与人力残缺家庭成员在创业动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表3列示了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动机之间关系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1—模型3分析了家庭结构与机会型创业之间的关系;模型4—模型6分析了家庭结构与生存型创业之间的关系。

表3模型1的结果表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与机会型创业显著正相关( $\beta=0.22, p<0.05$ ),且该结果在模型3中依旧稳健,说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多出于社会性动机,比如成就一番事业或者寻求个人更大的发展而选择创业,假设2a得到支持。模型2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机会型创业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人力残缺家庭创业的社会性动机较弱。模型4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生存型创业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创业的经济性动机并不强。模型5的结果表明,农村人力残缺家庭与生存型创业显著正相关( $\beta=0.21, p<0.1$ ),且该结果在模型6中依旧稳健,说明农村人力残缺家庭成员更多地是出于经济性动机,比如改善目前生活现状而创业,假设2b得到支持。

另外,本文还进一步统计了不同家庭结构农民创业动机的差异性,结果发现有48个人力残缺家庭样本出于社会性动机而创业,有495个社会精英家庭样本出于经济性动机而创业,可见社会精英家庭中不乏生存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中也存在机会型创业。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部分社会精英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比如某些体制内的村干部两袖清风,仅依靠有限的工资收入维持家庭生计,某些德高望重的农村精神领袖可能并不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等,这部分社会精英家庭的生活较为拮据,其创业动机更可能是出于改善生活现状的经济性动机。同样地,人力残缺家庭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比如某些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虽然家庭残缺,但父母均收入不菲且有一定的积蓄,这种残缺家庭成员创业的社会性动机更强。但总体而言,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成员则更可能选择生存型创业。

### 3. 反向因果检验

尽管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精英家庭将提高农民创业的概率,但农民的创业行为也可以促使其家庭成员成为农村精英,即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的关键在于确定家庭成员成为精英的时间与农民个体创业时间的先后顺序。为此,本文根据家庭成员的村干部当选时间、入党时间等推算家庭成员成为精英的时间,再结合农民的创业时间,剔除创业时间早于精英身份获取时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以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表4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eta=0.14,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2中依旧稳健,说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创业的可能性较大,本文假设1a得到进一步支持。模型2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区域关系文化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beta=0.01, p<0.01$ ),说明区域关系文化在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假设3a得到进一步支持。模型3的结果表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与机会型创业显著正相关( $\beta=0.23, p<0.05$ ),且该结果在模型4中依然稳健,说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型创业,即其创业的社会性动机更强,本文假设2a得到支持。模型5、模型6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生存型创业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

### 4. 敏感性分析

关于创业的实证文献表明,个体周边的创业氛围将对其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身边正在创业的亲戚朋友数量多,则由此产生的羊群效应(Peer Effect)将影响个体向创业转移的意愿和动力(蒋剑勇和郭红东,2012);同时,农民个体的商业网络也将影响到其创业决策,尤其是其与银行等

表3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动机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M1	M2	M3	M4	M5	M6
<i>Gender</i>	0.2285* (0.1243)	0.2158* (0.1241)	0.2305* (0.1243)	-0.2576*** (0.0848)	-0.2578*** (0.0847)	-0.2606*** (0.0849)
<i>Age</i>	-0.0666** (0.0301)	-0.0702** (0.0299)	-0.0656** (0.0301)	0.0178 (0.0222)	0.0174 (0.0222)	0.0167 (0.0222)
<i>Age<sup>2</sup></i>	0.0005 (0.0003)	0.0006* (0.0003)	0.0005 (0.0003)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i>Marriage</i>	0.0577 (0.1887)	0.0750 (0.1882)	0.0532 (0.1887)	-0.0475 (0.1424)	-0.0478 (0.1422)	-0.0444 (0.1424)
<i>Religion</i>	-0.0494 (0.1493)	-0.0456 (0.1491)	-0.0477 (0.1493)	0.0406 (0.1114)	0.0394 (0.1114)	0.0391 (0.1114)
<i>Faminum</i>	0.0013 (0.0302)	0.0119 (0.0298)	0.0012 (0.0302)	0.0303 (0.0224)	0.0291 (0.0222)	0.0308 (0.0224)
<i>Maler</i>	-0.1433 (0.2175)	-0.0666 (0.2141)	-0.1474 (0.2177)	0.0549 (0.1589)	0.0481 (0.1572)	0.0607 (0.1590)
<i>Farmland</i>	-0.0214*** (0.0069)	-0.0206*** (0.0069)	-0.0214*** (0.0069)	0.0108** (0.0045)	0.0108** (0.0045)	0.0109** (0.0045)
<i>Income</i>	0.0092*** (0.0014)	0.0091*** (0.0014)	0.0092*** (0.0014)	-0.0074*** (0.0013)	-0.0074*** (0.0013)	-0.0074*** (0.0013)
<i>Network</i>	0.0014*** (0.0002)	0.0014*** (0.0002)	0.0014*** (0.0002)	-0.0008*** (0.0002)	-0.0008*** (0.0002)	-0.0008*** (0.0002)
<i>Mkt</i>	0.0402* (0.0238)	0.0413* (0.0238)	0.0403* (0.0239)	-0.0100 (0.0173)	-0.0098 (0.0173)	-0.0097 (0.0173)
<i>Expectation</i>	0.1029*** (0.0355)	0.1081*** (0.0354)	0.1026*** (0.0355)	-0.0853*** (0.0263)	-0.0857*** (0.0262)	-0.0848*** (0.0263)
<i>Handicraft</i>	0.0885 (0.0841)	0.0884 (0.0841)	0.0875 (0.0841)	0.0206 (0.0626)	0.0211 (0.0626)	0.0214 (0.0626)
<i>Relation</i>	0.0092*** (0.0031)	0.0094*** (0.0030)	0.0092*** (0.0031)	-0.0014 (0.0023)	-0.0014 (0.0023)	-0.0014 (0.0023)
<i>Socistatu</i>	0.1003*** (0.0384)	0.1061*** (0.0383)	0.1003*** (0.0384)	0.0253 (0.0290)	0.0244 (0.0289)	0.0255 (0.0290)
<i>HmnCapital</i>	0.0082 (0.0761)	-0.0024 (0.0757)	0.0045 (0.0761)	0.0942* (0.0507)	0.0997** (0.0507)	0.0987* (0.0507)
<i>HmnCapital<sup>2</sup></i>	0.0018 (0.0037)	0.0026 (0.0037)	0.0019 (0.0037)	-0.0081*** (0.0026)	-0.0084*** (0.0026)	-0.0083*** (0.0026)
<i>Elite</i>	0.2248** (0.0967)		0.2290** (0.0968)	-0.0346 (0.0751)		-0.0402 (0.0752)
<i>Disinte</i>		-0.1574 (0.1659)	-0.1725 (0.1661)		0.2133* (0.1155)	0.2158* (0.1156)
<i>Cons</i>	-2.0479*** (0.7894)	-2.0647*** (0.7865)	-2.0317** (0.7895)	0.1041 (0.5851)	0.0864 (0.5853)	0.0793 (0.5855)
Chi <sup>2</sup>	252.9224	248.5231	254.0357	202.2250	205.4288	205.7150
Pseudo R <sup>2</sup>	0.0613	0.0603	0.0616	0.0318	0.0323	0.0323
N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4 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的反向因果检验

	是否创业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M1	M2	M3	M4	M5	M6
<i>Gender</i>	0.5129*** (0.0545)	0.5115*** (0.0545)	0.2327* (0.1256)	0.2330* (0.1256)	-0.2662*** (0.0860)	-0.2670*** (0.0860)
<i>Age</i>	0.1711*** (0.0137)	0.1713*** (0.0137)	-0.0736** (0.0302)	-0.0733** (0.0302)	0.0218 (0.0224)	0.0216 (0.0224)
<i>Age<sup>2</sup></i>	-0.0020*** (0.0001)	-0.0020*** (0.0001)	0.0006* (0.0003)	0.0006* (0.0003)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i>Marriage</i>	0.7063*** (0.0967)	0.7094*** (0.0967)	0.0658 (0.1912)	0.0642 (0.1913)	-0.0755 (0.1442)	-0.0746 (0.1442)
<i>Religion</i>	-0.0704 (0.0781)	-0.0685 (0.0782)	-0.0528 (0.1517)	-0.0531 (0.1516)	0.0134 (0.1131)	0.0126 (0.1131)
<i>Famimum</i>	0.0961*** (0.0159)	0.0954*** (0.0159)	-0.0001 (0.0305)	0.0008 (0.0305)	0.0292 (0.0226)	0.0287 (0.0226)
<i>Maler</i>	0.3854*** (0.1085)	0.3866*** (0.1085)	-0.2036 (0.2205)	-0.1980 (0.2207)	0.0994 (0.1607)	0.0972 (0.1607)
<i>Farmland</i>	0.0216*** (0.0039)	0.0212*** (0.0039)	-0.0208*** (0.0069)	-0.0206*** (0.0069)	0.0107** (0.0046)	0.0106** (0.0046)
<i>Income</i>	0.0307*** (0.0014)	0.0307*** (0.0014)	0.0093*** (0.0014)	0.0093*** (0.0014)	-0.0070*** (0.0013)	-0.0070*** (0.0013)
<i>Network</i>	0.0034*** (0.0002)	0.0034*** (0.0002)	0.0014*** (0.0002)	0.0014*** (0.0002)	-0.0009*** (0.0002)	-0.0009*** (0.0002)
<i>Mkt</i>	-0.0279** (0.0121)	-0.0278** (0.0121)	0.0479** (0.0242)	0.0482** (0.0242)	-0.0118 (0.0176)	-0.0120 (0.0176)
<i>Expectation</i>	0.0745*** (0.0187)	0.0740*** (0.0187)	0.0964*** (0.0358)	0.0965*** (0.0358)	-0.0882*** (0.0266)	-0.0883*** (0.0266)
<i>Handicraft</i>	0.1223*** (0.0443)	0.1224*** (0.0444)	0.0690 (0.0850)	0.0695 (0.0850)	0.0406 (0.0632)	0.0404 (0.0632)
<i>Relation</i>	-0.0073*** (0.0016)	-0.0071*** (0.0016)	0.0088*** (0.0031)	0.0090*** (0.0031)	-0.0012 (0.0023)	-0.0012 (0.0023)
<i>Socistatu</i>	0.0388* (0.0203)	0.0409** (0.0203)	0.1025*** (0.0388)	0.1013*** (0.0388)	0.0257 (0.0292)	0.0264 (0.0293)
<i>HmnCapital</i>	0.1037*** (0.0340)	0.1030*** (0.0340)	0.0178 (0.0770)	0.0190 (0.0771)	0.1016** (0.0513)	0.1015** (0.0513)
<i>HmnCapital<sup>2</sup></i>	-0.0075*** (0.0018)	-0.0074*** (0.0018)	0.0010 (0.0038)	0.0009 (0.0038)	-0.0084*** (0.0027)	-0.0084*** (0.0027)
<i>Elite</i>	0.1389*** (0.0533)	0.1368** (0.0533)	0.2329** (0.0984)	0.2416** (0.0989)	-0.0418 (0.0765)	-0.0450 (0.0767)
<i>Elite×Relation</i>		0.0132*** (0.0037)		-0.0051 (0.0068)		0.0041 (0.0053)
<i>Cons</i>	-7.0391*** (0.3733)	-7.0571*** (0.3734)	-1.8765** (0.7947)	-1.9015** (0.7958)	0.0170 (0.5904)	0.0229 (0.5905)
Chi <sup>2</sup>	2674.34	2686.97	247.7569	248.3273	197.0468	197.6571
Pseudo R <sup>2</sup>	0.1621	0.1629	0.0613	0.0615	0.0316	0.0317
N	14035	14035	4502	4502	4502	4502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金融机构的关系对于创业初期的成功融资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显示,家庭结构的确会对农民创业产生影响,但无法确定其是否对农民个体的创业氛围及金融机构的商业关系等具有同等影响。为此,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控制了农民个体的创业氛围(*Climate*)和商业关系(*Brelation*)与家庭结构的交互项(见表5)。创业氛围主要用“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朋友中创业的总人数”来测量;商业关系则用“在银行(包含农村合作社、农商行、信用社)及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等)任职的亲友数量”来测量。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创业氛围和商业关系与家庭结构的交互项,检验结果也与上文基本一致,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作用仍旧存在,且基本上创业氛围和商业关系与家庭结构的交互项基本均不显著(见表5)。

### 5. 稳健性检验

(1)更换家庭结构的测量指标。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以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作为社会精英家庭的替代变量,以家中是否有残疾的兄弟姐妹作为人力残缺家庭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表7。

表6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eta=0.17,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2、模型5中依然稳健,说明社会精英家庭将显著提高农民创业的概率,假设1a得到支持。模型2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区域关系文化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beta=0.01, p<0.01$ ),且该结果在模型5中依旧稳健,说明区域关系文化在社会家庭精英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a得到支持。模型3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eta=-0.18, p<0.05$ ),且该结果在模型4、模型5中依然稳健,说明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不倾向于选择创业,假设1b得到支持。模型4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

表5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的敏感性分析

	社会精英家庭			人力残缺家庭		
	是否创业 M1	机会型创业 M2	生存型创业 M3	是否创业 M4	机会型创业 M5	生存型创业 M6
<i>FamStruc</i>	0.1654*** (0.0529)	0.2320** (0.0994)	-0.0333 (0.0758)	-0.4348*** (0.0756)	-0.2660 (0.1782)	0.2153* (0.1190)
<i>FamStruc</i> × <i>Relation</i>	0.0128*** (0.0037)	-0.0038 (0.0067)	0.0031 (0.0052)	-0.0014 (0.0056)	0.0018 (0.0127)	-0.0228*** (0.0087)
<i>FamStruc</i> × <i>Climate</i>	0.0075 (0.0061)	-0.0055 (0.0077)	-0.0025 (0.0039)	0.0031 (0.0096)	0.0200* (0.0116)	0.0029 (0.0095)
<i>FamStruc</i> × <i>Brelation</i>	-0.0080 (0.0193)	0.0330 (0.0267)	0.0068 (0.0224)	0.0107 (0.0230)	0.0303 (0.0331)	-0.0211 (0.03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7.0603*** (0.3714)	-2.1007*** (0.7915)	0.0999 (0.5854)	-6.9765*** (0.3712)	-2.0472*** (0.7871)	0.0801 (0.5858)
Chi <sup>2</sup>	2742.75	255.3110	203.1266	2752.26	253.1163	213.3276
Pseudo R <sup>2</sup>	0.1640	0.0619	0.0319	0.1646	0.0614	0.0335
N	14133	4600	4600	14133	4600	4600

注:\*\*\* $p<0.01$ ,\*\* $p<0.05$ ,\* $p<0.1$ ,括号内为标准差。表5—表7的回归中包括所有控制变量,完整的结果可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下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6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决策的稳健性检验**

	M1	M2	M3	M4	M5
<i>Elite</i>	0.1749*** (0.0549)	0.1720*** (0.0550)			0.1732*** (0.0551)
<i>Elite</i> × <i>Relation</i>		0.0141*** (0.0038)			0.0141*** (0.0038)
<i>Disinte</i>			-0.1836** (0.0934)	-0.1859** (0.0936)	-0.1897** (0.0937)
<i>Disinte</i> × <i>Relation</i>				-0.0044 (0.0071)	-0.0046 (0.007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7.0568*** (0.3712)	-7.0690*** (0.3713)	-7.0577*** (0.3707)	-7.0544*** (0.3707)	-7.0508*** (0.3714)
Chi <sup>2</sup>	2727.03	2740.46	2720.95	2721.34	2744.99
Pseudo R <sup>2</sup>	0.1631	0.1639	0.1627	0.1628	0.1642
N	14133	14133	14133	14133	14133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各列回归中包括了控制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7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动机的稳健性检验**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M1	M2	M3	M4	M5	M6
<i>Elite</i>	0.2195** (0.1000)		0.2228** (0.1001)	-0.0151 (0.0781)		-0.0222 (0.0782)
<i>Disinte</i>		-0.1523 (0.1982)	-0.1680 (0.1983)		0.3137** (0.1391)	0.3153** (0.139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2.0376*** (0.7893)	-2.0804*** (0.7864)	-2.0402*** (0.7893)	0.1069 (0.5851)	0.1116 (0.5852)	0.1070 (0.5854)
Chi <sup>2</sup>	252.3286	248.2044	253.0696	202.0495	207.1296	207.2104
Pseudo R <sup>2</sup>	0.0612	0.0602	0.0614	0.0318	0.0326	0.0326
N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差。各列回归中包括了控制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家庭与区域关系文化指数的交互项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区域关系文化在人力残缺家庭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并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3b 没有得到支持。

表 7 模型 1 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机会型创业显著正相关(beta=0.22,p<0.05),且该结果在模型 3 中依然稳健,说明农村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多地是出于社会性动机选择创业,本文假设 2a 得到支持。模型 2 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机会型创业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人力残缺家庭成员创业的社会性动机较弱。模型 4 的结果则表明,社会精英家庭与生存型创业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说明社会精英家庭成员创业的经济性动机较弱。表 7 模型 5 的结果表明,人力残缺家庭与生存型创业显著正相关(beta=0.31,p<0.05),且该结果在模型 6 中依旧稳健,说明人力残缺家庭成

员更多地是出于经济性动机而创业,本文假设 2b 得到支持。

(2)其他稳健性检验:①本文将家庭成员中的村干部、党员以及德高望重者的数量进行加总,并以此作为社会家庭精英的替代变量做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同时,本文还将上述绝对数指标除以家庭成员总数,得到社会精英家庭的相对数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②由于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哑变量,对此类问题通常采用 Logit 模型或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因而本文进一步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③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创业决策的作用,本文进一步将社会精英家庭界定为家庭成员中拥有村干部、党员及德高望重者,且家庭收入居于村落中上层以上的家庭;并将人力残缺家庭界定为单亲家庭、兄弟姐妹或子女父母中有残疾的,且家庭收入低于村落中下层的家庭,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④考虑到社会精英家庭可能存在父母离异或家人伤残的情况,人力残缺家庭也可能有村干部等精英人物,基于此,本文将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重叠的样本剔除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家庭资本理论将家庭结构分为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并使用上海财经大学 2016 年“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就两种类型的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农民的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如家庭中拥有村干部、党员及德高望重者,将显著提高其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而人力残缺家庭背景,比如父母离异、兄弟姐妹残疾、老人或子女残疾等,将降低农民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②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在创业动机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社会精英家庭出身的农民主要出于社会性动机而选择创业,即典型的机会型创业;人力残缺家庭出身的农民虽然不倾向于创业,而一旦选择创业则主要是出于生存或改善生活现状等经济性动机,即典型的生存型创业。③社会精英家庭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作用还受到区域关系文化的制约,即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地区社会精英家庭更能激发农民创业的动力。上述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社会精英家庭衍生出来的家庭资本的确能为农民带来一定的资源优势,进而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向创业转移的概率,人力残缺家庭出身的农民则由于可承担损失的降低而抑制了其从事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在关系文化较弱的地区,家庭精英背景衍生出来的社会资本的回报将有所下降,拥有精英背景的农民个体创业的概率也随之降低。相反,在关系文化较强的区域,家庭精英所拥有的关系、圈子将转化为权利主体个人拥有的市场力量,此时精英背景的回报将显著提高,进而激励了农民个体的创业行为。另外,很多学者认为生存压力是农民创业的主要驱动力,而事实上,农民创业的动机不仅受到个体主观特质与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所在家庭结构特征的制约,比如资源相对丰裕的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可能出于社会性动机而创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力残缺家庭更可能出于经济性动机而创业,家庭结构的异质性将产生差异化的创业动机。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贡献:①很多学者从个体特质、制度环境等角度研究个体创业决策行为,鲜有文献关注到家庭结构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作用。本文基于家庭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家庭结构与创业关系的理论模型,这进一步丰富了创业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创业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②本文着眼于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分析了社会精英家庭与人力残缺家庭这两种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并将宏观层面的区域关系文化纳入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农民创业的权变模型,这对于推动中国农民创业理论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③本文还进一步分



析了家庭结构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剖析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创业行为的深层次动因,而且深入挖掘了农村情境下个体创业行为的家庭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对于实践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①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精英家庭的农民是农村创业的主力军,而人力残缺家庭成员的创业动力相对不足,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人力残缺家庭农民的创业支持。②创业资源的匮乏与家庭结构的脆弱显著减少了农村人力残缺家庭的可承担损失,进而抑制了其从事冒险性创业行为的积极性,政府应提供相关政策缓解这部分家庭的资本约束,降低其创业成本负担,尤其应提供风险补偿方面的政策措施激发人力残缺家庭农民的创业动力,增强农村弱势家庭的创业意愿和风险承担能力。③由于受到农村地域条件以及普通农民素质条件的限制,政府对农民创业优惠政策可能被农村精英群体所俘获,精英农户更容易利用现有优势占有农村资源,为自己和家人谋取更多利益,最终达到精英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普通农户的效用最大化,这种“精英俘获”现象将提高精英农户的创业概率,却抑制了农村人力残缺家庭中弱势农民的创业动机。因此,政府出台制度优惠政策时应深入农村实际查找问题,切实将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确保绝大多数农民知晓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政府政策。④政府在加大政策落实的同时应加强防范监管,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目标,避免政策实施错位等现象的发生,力求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争取通过政策的扶持解决人力残缺家庭等贫困农户的创业难题。⑤中国农民创业多为追求物质财富的生存型创业,但机会型创业通常更具韧性和创造性,因而更能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以政府应采取鼓励富含创新精神的机会型创业,在关注生存型农民创业者需求的同时,应提高对机会型创业者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 窦大海,罗瑾琰. 创业动机的结构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J]. 管理世界, 2011,(3):182-183.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 [3] 蒋剑勇,郭红东. 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2):20-27.
- [4] 李海峥,贾娜,张晓蓓,Barbara Fraumeni. 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及发展动态[J]. 经济研究, 2013,(7): 49-62.
- [5]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 牢笼的束缚与抗争:地区关系文化与创业企业的关系战略[J]. 管理世界, 2016,(10):88-102.
- [6] 陆学艺. 内发的村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7] 罗党论,刘晓龙. 行业壁垒、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J]. 管理世界, 2009,(5):97-106.
- [8] 罗明忠. 个体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2):11-19.
- [9] 罗明忠,罗琦. 家庭禀赋对农民创业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6,(5):13-19.
- [10] 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2(3): 151-162.
- [11] 全志辉.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 社会学研究, 2002,(1):1-9.
- [12] 全志辉,贺雪峰.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1): 158-167.
- [13] 卫武. 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2):95-109.
- [14]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 2008,(7): 130-141.
- [15] 吴一平,王健. 制度环境、政治网络与创业:来自转型国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5,(8):45-57.
- [16] 吴愈晓.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 2010,(2):125-150.
- [17] 杨善华.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0,

- (3):101-108.
- [18][意]帕累托. 精英的兴衰[M]. 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9]朱光伟,杜在超,张林. 关系、股市参与和股市回报[J]. 经济研究, 2014,(11):87-101.
- [20]Aidis, R., S. Estrin, and T. Mickiewicz.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Rus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23(6):656-672.
- [21]Aldrich, H. E., and J. E. Cliff.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18(5):573-596.
- [22]Amit, R., and E. Muller. Push and Pull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1995,12(4):64-80.
- [23]Bai, C. E., J. Lu, and Z. Tao.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6,14(4):611-628.
- [24]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 [25]Bird, B. J.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M]. London, UK: Scott, Foresman and Co. 1989.
- [26]Bowen, H. P., and D. De Clercq.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39(4):747-767.
- [27]Chen, S., Z. Sun, S. Tang, and D. Wu.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17(2):259-271.
- [28]Choo, S., and M. Wo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riggers and Barriers to Venture Creation in Singapore[J].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2006,28,(2):47-64.
- [29]Dercon, S. Growth and Shock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74(2):309-329.
- [30]Dew, N., S. Sarasathy, S. Read, and R. Wiltbank. Affordable Loss: Behavioral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Plunge Decis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9,3(2):105-126.
- [31]Flannery, M. J., and K. P. Rangan. Partial Adjustment toward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79(3):469-506.
- [32]Folmer, H., S. Dutta, and H. Oud. Determinants of Rural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in West Bengal: A Structural Equations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0,33(4):367-396.
- [33]George, G.,R. Kotha, P. Parikh, T. Alnuaimi, and A. S. Bahaj. Social Structure, Reasonable Gai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37(6):1118-1131.
- [34]Gilad, B., and P. A. Levine. A Behavior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Supply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86,24(4):45-53.
- [35]Grande, J.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Farm Sector-critical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1,27(2):220-233.
- [36]Hoffman, J., M. Hoelscher, and R. Sorenson. Achieving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Family Capital Theory[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6,19(2):135-145.
- [37]Kahneman, D.,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1979,47(2):263-291.
- [38]Komppula, R. 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A Cas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40(1):361-371.
- [39]Li, G., B. Wu, and G. Bai. Investigation on the Success of Peasant Entrepreneurs [J]. *Physics Procedia*, 2012,25:2282-2286.
- [40]Ma, Z.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 Rural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34(10):1763-1784,
- [41]March, J. G., and Z. Shapira. Variable Risk Preferences an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2,99(1):172-183.
- [42]Miller, R. D., and M. J. Leiblein. Corporate Risk-return Relations: Returns Variability versus Downside Ris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39(1):91-122.
- [43]Nee, V.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37(1):1-27.
- [44]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5]Renzulli, L. A., H. E. Aldrich, and J. Moody. Family Matters: Gender,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J]. *Social Forces*, 2000,79(2):523-546.
- [46]Sarasvathy, S. D.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26(2):243-263.
- [47]Scott, L. A. Support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J].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2012,11(4):19-25.
- [48]Yu, J., J. X. Zhou, Y. Wang, and Y. Xi.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an Emerging Economy: Reading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Entrepreneur Storie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3,51(2):183-195.

## Family Structure and Peasants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TVS Data

YANG Chan, HE Xiao-gang, LI Zheng-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explore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trait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fac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family factors. How family structure affect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is still an unexplored research question. Based on family capital theory and by using data of Chinese Thousand Village Survey (CTVS) in 2016, this paper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ies structure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ge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①The elite background of rural family, ie. family member holding village cadre title, being a party member, or regarded as respectable person,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asan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le as soon as the family structure is broken, ie. divorce, disability of siblings, kids or parents, wi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peasan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②Peasants in elite famil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opportunity-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ose in disintegration famil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survival-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③The regional GuanXi culture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elite family and peasa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Peasants in elite famil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start new business in the areas with strong GuanXi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nese rur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which can help to explore the family factors and their mechanism of encouraging peasa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t ha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aradigm.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peasants; elite families; disintegration families

**JEL Classification:** L26 R51 Q12

[责任编辑:王燕梅]